



热线电话: (0531) 85193379 Email: yao@dzwww.com

齐鲁文化

风筝：飞上云端的文化

□ 王清林

送至蓝天白云间!今天,古老的技艺没有失传,仍影响着潍坊人的生活,从而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风筝文化。

作为潍坊风筝会的发起人,已经86岁的孙立荣老人说起风筝的文化和历史仍旧滔滔不绝。

风筝起源于中国,相传最早的风筝是由古代哲学家墨翟在山东制造的。据《韩非子·外储说》载:“墨翟居鲁山(今潍坊青州一带),斫木为鸢,三年而成,飞一日而败。”意思是墨子在鲁山研究了三年,用木头制成一只鸟,飞了一天就坏了。墨子做的这只“木鸢”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风筝,潍坊也因此成为风筝的发源地。

风筝问世后,首先被用于飞越险阻,测量、传递信息等军事需要。据说汉朝大将韩信曾利用风筝进行测量。梁武帝时曾利用风筝传信,但未成功。南北朝有人背着风筝从高处跳下而没有跌死。唐朝的张丕被困困时曾利用风筝传信求救兵,取得了成功。也是从这时起,风筝传向国外。在欧洲产业革命形势的影响下,中国的玩具风筝在那里向着飞行器发展。因此,在美国华盛顿宇航博物馆的大厅里挂着一只中国风筝,在它边上写着:“人类最早的飞行器是中国的风筝和火箭。”

风筝的另一个发展方向是娱乐。也是唐宋时期风筝传入民间,成为人们的娱乐玩具。潍坊作为风筝产地,明代民间出现专门扎制风筝的艺人。随着放风筝习俗的流行,清代风筝艺术发展到鼎盛阶段。道光时郭麟竹枝词吟道:“一百四日小寒食,冶游争上白浪河,纸鸢儿子秋千女,乱比新来春燕多。”《潍县志》也记载:“清明,小儿女作纸鸢,秋千之戏,纸鸢其制不一,于鹤、燕、蝶、蝉各类之外,兼作种种人物,无不惟妙惟肖,奇巧百出。”清末年间,潍坊已形成了固定的风筝市场,涌现出了一大批手艺高超的风筝艺人,全国各地的商贾都来潍坊购买风筝,一时间“花样翻新招主顾,双双蝴蝶

鸢成行”。

现代潍坊风筝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赢得了“风筝艺术,潍坊第一”的美誉。

普通的风筝看似简单但也要经过设计、选料、整形、绑扎、裁剪、绘画、装配、拴脚线、试放等十道工序,其主要工艺过程可概括为扎、糊、绘、放四部分,通常称作“风筝四艺”,也有的总结为“扎、糊、绘、放、风、线”六门技能。

风筝很讲究平衡,只要风筝结构合理,一般放时利用风力作用就能飞上空中。但相比起来,龙风筝等一些造型复杂的风筝就要讲究多了。风筝的头尾大小、风筝的面积、竹篾的厚度、软硬度等都要考虑在内。

老潍县风筝是由潍县的一些扎彩艺人为了市场的需求和对风筝艺术的喜爱而制作的,后来又加上一些喜爱绘画的文人雅士的参与,逐渐形成了扎工细腻、品种齐全,绘画精细,放飞性能稳定、题材繁多的艺术风格,其主要题材有人物、禽鸟、宫灯、八卦等。

更让潍坊人引以为骄傲的潍坊国际风筝会,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已成功举办了28届,每年都吸引着大批中外风筝专家、爱好者和游人前来观赏、竞技和旅游。

孙立荣老人回忆说,1983年5月,上海市旅游公司和上海工艺美术协会联合组织中外风筝放飞表演交流活动。由于潍坊风筝的巨大影响力,主办方除邀请美国、日本等国外的风筝艺人参加外,在国内还单独邀请了潍坊参加,潍坊带去了各式风筝20只,其中,孙永春父子带去的50节大型龙头蜈蚣风筝引起了轰动。前来参加交流的美国西雅图风筝协会会长钱大卫先生,更对潍坊的风筝赞不绝口,给予了高度评价。

交流活动一结束,钱大卫专程赶到潍坊,参观了风筝展室和扎制现场后,欣喜地说:中国国内四

■ 图上齐鲁·镇馆之宝

丈八佛：见证抗日风云

□ 周巧云

在青岛市博物馆一楼西区大厅,两座大佛静立中央,神态宁静,身姿飘逸,造型优美。这两尊北魏石佛造像,是青岛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两尊大佛像身高各有一丈八尺(约6米),俗称“丈八佛”,每尊佛像重约30吨,距今已有1500多年。大佛头做高髻,面型瘦削适中,大耳下垂过于常人,深目高鼻,眉宇间有白毫相,面含微笑,赤足立于莲花座上,莲花瓣下置方形须弥座,座的前后刻有许多小佛像。大佛内着僧祇支,外着方领下垂袂衣博带式大衣,右手前伸,手心向外。大佛的雕刻技法娴熟,作“施无畏与远印”,衣纹细致柔和,神态栩栩如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的杰出之作。在一楼展厅内还另有两尊小菩萨造像,各高3米,造型服饰相同,手的姿势呈对称状,两尊都是阿弥陀佛的扶持菩萨,一尊是“观世音”,另一尊是“大势至”。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以来,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几百年间,全国各地大兴佛寺,雕塑佛像蔚然成风。从这四尊佛像身上,可以明显看出北魏孝文帝汉化政策实施后反映到佛教雕塑艺术上的风格,因此,大佛造像的建造年代应在北魏的景明、正始之后至北齐、北周之前。

这四尊佛造像原安放于临淄龙泉寺内。《临淄县志》记载:“龙泉寺在龙池村西北淄水岸上,尚有石佛四,各高丈八尺。”“六朝石佛,在龙池村龙泉寺故址,佛高丈余,有荷兰人见之,谓形容与印度古石佛相同,真齐朝物也,欲购之不可乃止。”1928年日军入侵山东时,日本人曾两次预谋将佛像盗回日本,1928年7月24日上海《申报》对此报道说:“临淄县龙池地方,有石佛两个(应是四个),成化碑一座,碎碑一方,在数年前曾有中国败类,拟将佛碑等以三万元之代价售予日本人,为地方人士闻知,出面干涉,故未成交,此次日本占据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以迄青岛,龙池适在日本人所谓之二十里以内,某日人垂涎龙池之古佛碑等已久,乃于本月十五日,率人将佛碑一并劫取,运至淄河车站,预备运往日本……”当时正逢济南“五三”惨案之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日本侵略者迫于形势,未敢将这批文物盗走,只将两尊小石像的头盗走。其余用草绳缠裹的石佛和石碑

今秋十月,是山东大学一百一十年华诞的纪念日。在山东大学档案馆里,我见到了被称之为为一百一十岁山大“准生证”的珍贵档案——来自于台湾故宫的原样复制的山东大学第一份档案《试办山东大学堂折及暂行章程》。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战争的惨败使中国人民真正从睡梦中惊醒,认识到中国要救亡图存,“不妨以强敌之师”,“取而鉴之”,“举而行之”,效法日本,实行变法。而要变法自强,关键在于兴学育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认为:“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梁启超也认为,“今日中国之大患,苦于人才之不足,而人才不足由学校不兴也”,主张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是兴学育才,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以光绪皇帝



“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两个半世纪以前,潍县知县郑板桥在他有名的《怀潍县》中生动描述了放风筝的情景。现在,风筝俨然已成为了中国的国粹。几根竹条和一张毛边纸,轻而巧地扎制在一起,就能把人所有的情绪从肺腑间捧出,托起,直

■ 群贤毕至

施闰章,顺治十三年到十七年任山东学政。五年中,施闰章做了许许多多有益于教育的事,使他名留青史的是他曾取蒲松龄为秀才第一。

蒲松龄“座师”施闰章

□ 高文秀

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在谈到聊斋名篇《胭脂》时说,《胭脂》既是杰出的人情小说,也是引人入胜的断案故事。县令把鄂生断成杀人犯,知府吴南岱聪明地断明了鄂生之冤,又武断地把秀才宿介断成凶手;学使施闰章采用心理战让真正的凶犯毛大露出原形。《胭脂》曾被戏剧大师梅兰芳改编为《牢狱鸳鸯》演出。

这施闰章乃真名实姓,顺治十三年到十七年任山东学政五年。五年中施闰章做了许许多多有益于教育的事,但使他名留青史的是他曾取蒲松龄为秀才第一。蒲松龄一生科举蹭蹬,惟在19岁时参加的秀才考试中连取淄川县、济南府、山东省三个第一,这与施闰章的赏识是分不开的,况且头名秀才比一般考中秀才更为荣耀,而且随着施闰章的文声日益高涨,蒲松龄也就越来越显得荣耀。

施闰章是宣城(今属安徽)人,号愚山,顺治进士”。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皆当世理学家。其父在施童年时去世;其叔施誉学识渊博,世称砥园先生。施闰章自幼即在叔父教养之下发愤读书,孜孜不倦;稍长,擅作诗赋、古文。进士及第授刑部主事后,他奉使广西,遍游粤西诸山水,开拓了胸襟。后朝廷选学使,他参加御试,名列榜首,于是,39岁的施闰章擢调山东学政按察司签事。

施闰章是清初杰出的文学家。其文师法北宋古文大家欧阳修、曾巩,绵密流畅;诗尊李白、杜甫,被誉为“尊唐派”首领,与当时山东诗人宋琬齐名,号“南施北宋”。时人汤斌在《愚山施公墓志铭》中说:“公知名海内者垂四十年。”稍后的文艺评论家袁枚在《随园诗话》中称宣城自古“多诗人,梅宛陵之后,本朝愚山先生其最著者也”,可见其在文坛上的地位和影响。施闰章生当明末清初的动乱之世,兵祸频仍,赋税繁多,民生凋弊,苦不堪言。他继承了汉乐府民歌与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以诗歌深刻地反映现实,如在《上留田行》中展现了一幅惨绝人寰的血腥图景。

施闰章工五言诗,其诗集中有五古、五律各900余首,颇有影响。与他同时代的著名诗人王士禛在《摘句图》序中说:“予读施愚山侍续五言诗,受其温柔敦厚,一唱三叹,有风人之旨,其章法之妙,如天衣无缝……至于清词丽句,迭见层出。”由于王士禛尤爱其五律佳句,特意将名句摘录汇编成《摘句图》,以“资艺苑谈助”,竟辑录施句82联之多。

施闰章任职山东期间,监察御史程某巡按山东,看到当时饥灾泉的颓废之状,就将自己的俸钱拿出来,命人浚泉



修桥,并让施闰章全面负责这项工程。于是,施闰章先带领工匠们“疏壅决滞,所去沙石成邱,剑拔雷轰,复泉之旧”,然后又以杉木修桥,并“施丹涂漆,铺槛以砖。桥下横置联锁,饮马者不得至。禁民间疾苦,遇疑狱反复推求,常至夜稍息。又于暇日修景贤、白鹭洲两书院;集弟子亲自讲学,大兴学。不久,因戍并监司而去职返乡,湖西“父老夹道焚香泣送数千里”,他作《别湖西父老》三绝句以谢。封建时代的官吏能得到人民如此厚爱,难能可贵。从此,施闰章居10年,朝廷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讲读,纂修明史,复转传读。他向以著述见长,此时益自奋勉,名声日显,于是“四方名士负籍问业无虚日”,而“公一一应之”,终积劳成疾,书未竣而逝,享年66岁,世人皆以“国家失此良史才为可惜”。

施闰章另赴高就后,蒲松龄就乡试不中,回想起施闰章对他的提携之恩,就更加感激施闰章对他的垂青。于是,蒲松龄就借《胭脂》这个故事,大张旗鼓地夸赞施闰章的“爱才护才”。在《胭脂》附则中,蒲松龄直接出来说:“愚山先生,吾师也。方见知时,余犹童子。窃见其笑进士子,拳拳如恐不尽。小有冤仰,必委曲呵护之,曾不肯作威学校,以媚权要。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已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这真是一篇真情告白。

然而,自施离鲁后,不仅二人并无见面机会,而且康熙十八年《聊斋》大体成稿,只在小范围内传播。四年后,施闰章溘然仙逝,很可能生前并未能一睹学生终其一生的成果。

■ 尺书闲话

这样的副手

不寻常

□ 张 伟

《水浒传》中有两个做得非常成功的副手:前期是辅佐晁盖的宋江,后期是辅佐宋江的卢俊义。宋江不居功自傲,甘坐第二把交椅,辅佐晁盖把梁山事业搞得红红火火;卢俊义审时度势,不仅让宋江顺利坐上第一把交椅,保住了自己的第二把交椅,还让众人服服帖帖。当好副手也是一门学问。

宋江上了梁山,晁盖为报宋江私放之恩,让宋江坐第一把交椅。但第一把交椅不是晁盖的私物,宋江即使有心取而代之,也不能贸然接受。宋江刚上梁山,寸功未立,如果他坦然接受,必遭好汉们的置疑。宋江不仅没有接受让位,而且行事低调,在晁盖面前十分谦恭,对众兄弟礼遇有加,他不辞辛劳不断带领人马出去攻城略地,树立了无人能比的威望,赢得了众位弟兄的支持,且不居功自傲,为自己积累了足够的资本。照理说,晁盖死后,副手宋江可自然接替。可晁盖换了史文恭一箭后,对宋江说:“贤弟莫怪我说:若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宋江武艺平平,生擒史文恭,根本没有可能。如果霸王硬上弓,这不是宋江的风格,也不能让众位兄弟心服口服。既不能违背晁盖的遗训,又想水到渠成的转正,这需要高妙的技巧和手腕。当然,这也是他没有立即攻打曾头市为晁盖报仇的原因,也是他千方百计赚卢俊义上山的缘由。他必须找一个在梁山没有根基的人,既能完成复仇大业,又没有资格与他争高论下。

于是,卢俊义被赚上山是必然的。卢俊义一上梁山,宋江就让他替晁天王报了仇。宋江非要让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卢俊义是聪明之人,他知道,仅凭这一点人家白送的功劳就安然接受是万万不可的。底下全是宋江的患难弟兄,自己就只有一个燕青,如何在梁山安身立命?所以 he 只能推让,给宋江充分的理由,让宋江坐第一把交椅。

为了表示自己对晁天王遗训的充分尊重,宋江主张用抓阄的方式,与卢俊义分别领兵攻打东平府和东昌府,谁先赢谁当头。宋江认为,光有民意还不行,还需要天意,他要确保自己的绝对权威。

此时,卢俊义面临的是一场必须输的战斗,而且必须输得像模像样没有破绽。可事不遂人愿,宋江攻东平府遇阻,本跟着卢俊义的吴用听说后怕宋江输了,立即别了卢俊义,去帮宋江。宋江胜了,戏演得很逼真,既有民意,又有天意,他理所当然坐了第一把交椅。卢俊义也欢欢喜喜坐了第二把交椅,众人也信服,毕竟是他捉住了史文恭,替晁盖报了大仇。

宋江和卢俊义这两个副手都不同寻常。他们善于适时表达自己的声音。如攻打祝家庄前,杨雄和石秀来报信,当时晁盖要让两人拉出去杀了,这做法很轻率。宋江及时发话,劝说了晁盖,并亲自上阵,赢得了众兄弟的敬重。上司也有考虑不周之时,在管理理念等方面同正职保持一致是应该的,但在一些具体细节和原则性问题上,副手要懂得换位思索,适时提出自己的建议与看法,否则便是溜须拍马。副手还要协调好各种关系。晁盖被史文恭射死后,兄弟们都发誓要报仇,也认为宋江可以取而代之了,这都说明宋江在上下关系的协调方面做得是相当到位的。

做个好副手很难,太能干不行,功高盖主会有被封杀的危险;太窝囊不行,唯唯诺诺只会让人瞧不起。在正头面前必须学会服从,副手高明之处就是让正手感到自己很高明。善于做副手,才有望成为优秀的“一把手”。

■ 海岱一方

山东大学“准生证”

□ 刘旭光

为党的帝支持下,发动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颁布了一系列维新法令,推行新政。在文化教育方面,光绪皇帝发布了书院改学堂的上谕。上谕下达后,全国不少省份都积极行动起来,纷纷遵旨改书院为学堂,山东省第一个官办大学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办的。

光绪皇帝有关书院改学堂的上谕发布时,山东巡抚袁世凯正在家里休假,看到皇帝的谕旨后,回济南组织有关人员起草了试办山东大学堂的奏折及暂行章程,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1901年)上奏光绪皇帝,奏请先在省城设立大学堂,分斋督课,其中专斋相当于专科和大学,正斋相当于中学,备斋相当于小学。尤为重要的是,他还拟订了《山东大学堂章程》,分学堂办法、学堂条规、学堂课程及学堂经费四章,共计九十六节,对于如何创办省城大学堂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光绪皇帝于十月初六日朱批:“知道了,政务处暨各该衙门知道单并发。”奏陈得到了清廷的照准,于是,山东首先办起了一个官立山东大学堂,十月正式开学。这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在各省最早兴办的官立大

大学堂。

袁世凯在上奏折的同时,调蓬莱知县李于锴进行筹备。是年11月《折稿》获准,在济南泺源书院正式创办了官立山东大学堂。首任校长是政界闻人唐绍仪(时称管理总办)。第一批招收学生300人,分专斋、正斋、备斋,分斋督课。聘请中西教习50余人,后增至110多人,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课程设置除经史子集外,还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国语等20多门。学制初为三年,后改为四年。

伴随着山东大学堂的创立,产生了山东大学的第一份档案。因此,它被我称为百年山大的“准生证”,是弥足珍贵的“镇校之宝”。

这份“准生证”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当年十月,清学部大臣张百熙将《山东大学堂章程》转发各省,要求参照办理。许多地方的督抚学政在办学堂时,就是“仿照山东章程,就本省情形,现有财力”变通办理的。

□ 责任编辑 于岸青